

西南石窟文獻

第三卷

中國西南文獻叢書



0062

1017.04/213

100193

中國西南文獻叢書·第八輯

西南石窟文獻

第三卷



本輯主 編：胡文和

本冊執行編輯：胡文和

本卷目錄

四川道教佛教石窟藝術（修訂本）	胡文和撰	一
自序		三
凡例		六
正文		七
插圖一 北山摩巖造像部位圖		七〇四
插圖二 寶頂山摩崖造像部位圖		七〇六
插圖三 廣元千佛崖立面圖		七〇八

胡文和撰

四川道教佛教石窟艺术

(修订本)

自序

法國科學院院士R（格魯塞）《從希臘到中國》一書的「結束語」中說：

『我們這次旅行已經歷了許多世紀，不知有多少旅途中經過的帝國早已在我們的脚步下跨臺了，當我們結束這次旅行的時候，還有什么話可講的呢？……從歷史和宗教本身的範疇來看，有些更為高大的東西，諸如佛陀永不消失的笑容，在哈達發現的頭像，和在雲崗石窟的佛陀中一樣，他們那種溫存和仁慈的笑容，……這種微笑的產生早于巴壤高棉藝術之前。希臘——佛教藝術畢竟是研究和繪制造型藝術先驅者的杰作，較之那些曇花一現的歷史人物和過渡性的社會興衰一樣，不是很好的向我們提供了幸福的最后一課嗎？』

該書是他繼東方文化史之后撰寫的東西文化交流的歷史輪廓。他是以前一個文化考古旅行者在古老的絲綢之路一帶巡禮的足跡而論述的。很可惜，他沒有涉足過老四川。與他時代大致相當的法人維克托·巴伽蘭（Victor Segalan），口人堂盤大付（Tokiwaka Daijio）和關野貞（Sekino Tadashi）曾經考察過老四川的廣元千佛崖，巴中南龕、樂山『麻王洞』等，石窟遺址。在他們的眼目中，老四川石窟中的佛雕，只不過是龍門諸石窟造像的復制品。更有甚者，海內外有的學者到老四川未作深入的實地考察，竟然把幾處著名遺址的道像誤認為是佛雕。原因在於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前，還尚未有一部全面介紹和研究老四川石窟遺址造像的文獻。

一九九四年十月拙著《四川道教佛教石窟藝術》（五十四萬字，黑白圖版二百八十六幅）出版，

引起了海內外學者對老四川石窟的極大興趣，他們接踵來到巴蜀考察。我也曾接待陪同過好幾批海內外著名的專家學者參觀老四川幾處重要的石窟遺址（路線由我安排），他們每到一處，都是留連忘返，倍加贊賞，認為其藝術價值遠遠超過了雲岡和龍門。看來，對中國石窟雕刻藝術的真正認識，上『幸福的最后一課』，應該是到老四川來，通過這條六世紀到十三世紀中華民族傳統藝術精髓所在的世代相傳舉世無雙的佛雕（道雕）大長廊^{〔二〕}，才能獲得真諦！

拙著出版至今快八年了。科技革命是日新月异，產品迭經換代。這也促勵社會科學研究者也應不斷更新自己的思維和科研方式及手段。鄭振鐸先生早就說過：『對一個從事敦煌佛教藝術保管和研究的人來說，還應該根據石窟幸存的寶貴資料，進行全面的排比、分析和研究，以克服學識淺陋，片面主觀的毛病。』^{〔三〕}這條寶貴的意見對我們也是完全適用。當年我從印刷廠取回第一本樣書閱讀后，就深深感到這個『嬰兒』存在著『先天不足』。

鑒于此，從一九九六年起，我就準備對本書《題材內容篇》中的幾個題目實施『大手術』，從比較學和圖像像的角度，將龍門、敦煌等材料列于前，與四川的進行比對研究，有的題目，或改寫，或合并，或推倒重來。一九九八年，我從德國講學歸國，帶回四十公斤資料^{〔三〕}，不僅加快了修訂的步伐，而且極大地充實和豐富了這些需要修訂部分的内容。例如：原書中〈地獄變相〉和〈大方廣華嚴十惡品經變〉就是合并、推倒重撰；〈父母恩重經變相〉這次則是第四稿，和原書中的比對，幾乎是『脫胎換骨』。

更值得慶幸的是，二〇〇〇至二〇〇一年，廣元市文物保管所在千佛崖搭架普查編號，我正好逢遇上這一珍貴的機會。一方面對中上層以前絕無可能達到的龕窟系統拍攝；一方面檢索原書所收

輯的碑刻題記所在龕窟以及書中例舉的造像龕窟的編號。現提供在修訂版中供讀者考察使用。

雖然一九九七年三月重慶市設為治轄市，大足石窟、合川涪灘石窟也隨著縣治劃出了老四川行政區，但為了全書的完整性，修訂版書名不改動。原因有二：一是原書第一卷〈分布概況〉是按河流流域述議的，與行政區劃無關；二是巴蜀本是一家，尤其是安岳、大足兩大石窟遺址緊密相連，不可能切然劃分開。特此說明。

這次修訂的文字內容約占原書的五分之一。我本願是想通過修訂使原書更趨于完善，雖竭盡駑鈍，但猶恐難以盡如人意，悖謬之處，敬請方家賜教斧正！

註釋：

〔一〕 還應包括在成都地區先后出土的六朝宋、齊、梁時代的寺院佛教雕刻作品。

〔二〕 與前引「法」格魯塞「結束語」都出自《從希臘到中國》，常書鴻譯，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五月版。

〔三〕 在柏林機場行李檢運處，法國航空公司空姐檢查到我行李超重，打開行包一看，見幾乎全是資料，慷慨免去我六百五十馬克的超重費，我向她表達了深切的謝意。

凡例

一、本書中對老四川各流域石窟遺址龕窟的考察，其龕窟號數為各級文物保護管理所編定。個別遺址編號近年來有變動的，均在本書中作了說明。

二、各流域石窟遺址中的龕窟規模尺寸，採用各級文管所測定并存入其檔案資料中的原始數據。龕窟數據按高乘寬乘深，或高乘寬排列，單位以厘米計。各像立身高、坐身高、卧身長，未標明形象附屬寶座的，皆為通高。

三、龕窟中各壁面和各形象的定位，以中心主像的方位和左右定位。

四、本文中引用的中文、外文文獻，第一次注明作者、文獻名稱（書籍或論文題目）、期數、頁碼，出版社以及出版時間；外文文獻名稱均譯成中文，再注，則只注明文獻中文、外文名稱，頁碼。

●本書注釋中引用的中文、外文參考文獻，均已注明出處，不再另單列，請讀者自行注意檢索。

四川道教佛教石窟藝術（修訂版）

胡文和

一 四川道教、佛教石窟的分佈概況

四川省有石窟的縣五十六個（圖三），其中龕窟在十個以上的近三百處，僅安岳縣境內就有一百零五處。可謂星落棋布，遍布全川。這些造像點，迄今為止，已被正式公佈屬於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的有六處，已被正式公佈屬於四川省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的有三十八處，龕窟在一百個以上，大、小像逾千尊的有十六處，它們是：廣元千佛崖、觀音崖，合川涑灘，潼南大佛寺，資中北，安岳卧佛院、千佛寨、圓覺洞，大足北山、寶頂山，蒲江飛仙閣，丹棱鄭山、劉嘴，夾江千佛崖、牛仙寺，仁壽牛角寨。

四川石窟造像點，絕大多數是沿着江河流域分佈的，似乎是重複漢代墓的分布狀況，因此我把它們所屬的流域分爲七個方位來敘述：嘉陵江流域；岷江、青衣江流域；沱江流域；涪江流域；沱江和涪江之間流域；沱江和岷江之間流域；南江、巴江、通江、宕水、渠江流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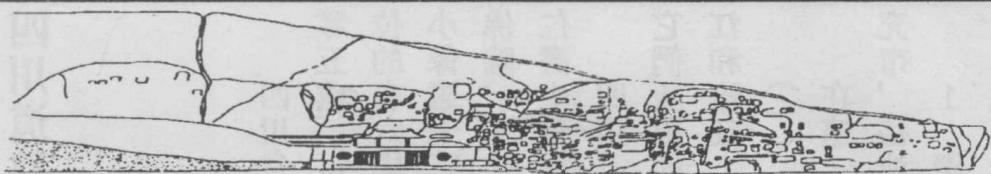
（一）嘉陵江流域

在這一流域地區內有造像龕窟點的市、縣是：廣元市，劍閣縣，閬中市，南部縣，營山縣，南充市，岳池縣，合川縣。

1 廣元市造像龕窟

主要分佈在千佛崖、皇澤寺、觀音崖三處。前兩者爲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後者爲省級文物

保護單位。



圖四 廣元千佛崖立面圖

千佛崖 在廣元市北五公里處的嘉陵江東岸，川陝公路由此通過，龕窟密如蜂房，最多的重疊達十三層，造像區長四百一十七米，最高處達四十米。據清咸豐四年（公元一八三四年）石碑記載：此處原存造像一萬七千餘尊。一九三四年國民黨政府因修築川陝公路，將石窟群炸毀近三分之一。現尚存九百餘龕窟^{〔一〕}，造像七千尊左右（圖四、圖五）。

千佛崖主要是唐代的造像遺址，還有北朝的造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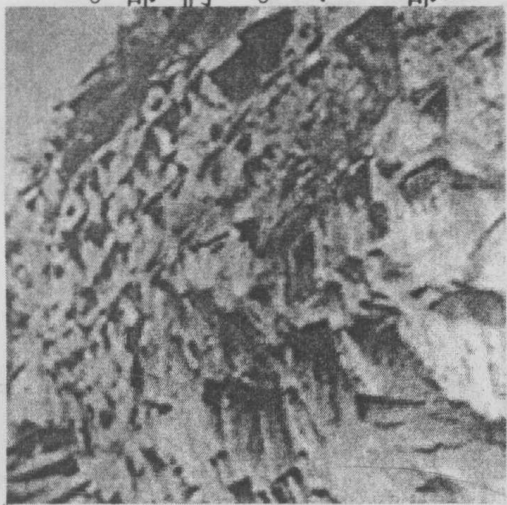
關於千佛崖的始鑿年代，一般都認為始鑿唐開元三年（公元七一五年），自當時的益州長史韋抗在此處開石道并雕鑿佛像以後，才陸續有所增造。韋抗的功德記刻在千佛崖中段中部大云古洞（第五百一十二號）左壁上（現實際為第五百一十三號的右壁），其文為：

『劍南道按察使銀青光祿大夫行益州大都督府長史韋抗功德碑開元十年六月□七日』。

該題刻的附近還有開元十年、元和二年、大中十三年題名、功德記，多達十餘通。

由於在千佛崖現存的造像題刻中，過去人們沒有找到比韋抗功德記更早的，因此一般都認為韋抗是首先在此地區開龕造像的第一人。

清乾隆年間《廣元縣志》中記載：



圖五 廣元千佛崖一九三三年被炸掉部份

『千佛崖……峭壁千仞，逼臨大江。……先是懸巖架木，作棧而行。唐韋抗鑿石爲路，并鑿千佛，遂成通衢』。

《四川通志·卷十二·山川》中也作如是說。

法國人維克托·色伽蘭(Victor Segalan)是本世紀第一位考察千佛崖的西方學者。由於他感興趣的是四川的巖墓和墓葬，而不是石窟造像藝術，加之當時千佛崖未經維修，有些南北朝時期的龕窟，他無法接近，不勝了解，但他說：『可以斷定，最初鑿巖之時在七二二年也』。^{〔二〕}後來日本人常盤大定(Tokiwa Daijō)和關野貞(Sekino Tadashi)也到千佛崖考察過，而他們的看法與色伽蘭一樣。

千佛崖原來保存有大量的造像題刻、妝修碑記，據民國版《廣元志稿》記載：

『巖有唐碑二十七，五代碑五，宋碑二十六，元碑二十六，明碑八，無年號四十一。今爲川陝公路，碑刻佛像，毀去幾半』。

現將《廣元志稿》中輯錄的有關唐、五代造像或妝修的碑刻題記，按年代順序輯錄如下，以資存查：

『王行淹造釋迦、救苦觀音像，唐武後大周萬歲（公元六九五五年）萬萬歲，共七行，字半模糊（在第五百三十五號窟附三十三至三十四龕之間）。』

李□□造像，唐中宗神龍二年（公元七〇六年）三月八日共二行，只十餘字可辨（在第四百九十三號窟）。

利州刺史畢公柏堂寺瑞像頌，此刻極大，約有二十餘行楷書，每行約五六十個字，今存只十七行，每行存上十八字，後三行則模糊難識，上有菩提瑞像篆文四字（在第三百六十六號窟）。

開元七年（公元七一九年）造像，楷書，共三行，只五六字可辨。

彭景宣，釋迦牟尼像，唐開元十年（公元七三二年）壬戌正書，共八行，一百零一字（在第一百五十號窟）。

唐益州長史韋抗造像，唐玄宗開元十年六月，正書逾寸大字二行，二十五字。此碑外尚有五種詩刻。附：

段文昌題名，唐憲宗元和二年（公元八〇七年）四月。鄭愚題名，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公元八五九年）六月三日。

李景讓題名。

左彌爲女郎造像。

楊永福題名。

以上五種皆係唐碑，在韋抗碑左右（均在第五百一十三窟右壁）。

開元十八年（公元七三〇年）造像，字體如斗，正書，在佛洞橫額，每行四字，前二行大唐開元十八年七字存，後只存勝因佛當四字，餘皆崩圯。

僧廣行造觀音地藏像，唐天寶十五載（公元七五六年）五月十五日，共四行楷書，字迹模糊（在第五百一十一號附三十五號壁上）。

元和造像殘碑一種，只元和二年（公元八〇七年）九月十四日數字影存，餘俱模糊。

劍州刺史李諷造當陽佛像，唐懿宗咸通十四年（公元八七三年）二月十五日，正書共五行，六十字（在第五百一十三號窟附二十號壁上）。

乾符造像殘碑，乾符三年（公元八七六年）八月，共六十餘字可辨。

晉國夫人造像，廣明元年（公元八八〇年）正月，正書十餘字可辨。

廣明造像碑一種，廣明元年二月，共五行，只十餘字可辨。

給事郎崔弘瞻禮殿記，廣明二年（公元八八一年）二月，同上二碑，共五行，五十九字。

田匡祚、趙師恪、張齊高題名，僖宗廣明二年六月，共六行，九十六字，正書。判官呂延宥等題名，廣明二年六月共四行，三十六字。

內府令王繼顯瞻禮殿記，唐僖宗中和元年（公元八八一年）十月四日。

新授朝散大夫王何題記，唐僖宗中和二年（公元八八二年）五月九日，楷書共十一行，九十七字（第二百五十一號）。

劉重孜題名，唐僖宗中和二年閏七月二日，共四行三十一字。

王氏四娘造像，唐僖宗中和四年（公元八八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共四行半，三十二字，磨滅四字。』

以上是有確切唐代年號的造像題刻。其它疑爲唐代的造像題刻有：

『利州長史上柱國許國公蘇頌造像』^{〔三〕}正書一行，共三十字（在第二百二十一號窟）。

巴州刺史李穎造像，楷書共四行，字已模糊。

利州長史上柱國王行淹造觀音像，共三行，皇甫思義楷書（在第五百三十五號窟附三十三號壁上）。

果州刺史王人□造像，正書一行八字。五代的造像和妝修碑刻題記如下：

『越國夫人四十二娘重修毗盧佛像，蜀王衍乾德六年（公元九二四年）七月十五日，楷書盈掌，字極佳，共六行，七十六字，下註徑寸楷書兩行，或係柏堂頌下截，此種在柏堂寺洞，重刻於畢公柏堂寺碑中間，上下仍是柏堂舊刻，後來居上，致前刻不能全讀，可幸之中不無可惜（在第三百六

十六號窟右壁)。

越國夫人路氏造像，正書，共八行，只一百餘字，後行磨滅十餘字（在第三百六十六號窟右壁）。

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李正矩裝飾三聖像，後唐明宗天成二年（公元九二七年）三月十一日，正書，共六行，約九十六字，殘缺數字（在第二百二十六號窟）。

劉處讓造像記，後唐明宗天成四年（公元九二九年），第一行只劉處二字有影，二行只天成四年歲次己巳字，三行安吉長幼四字，可識，餘皆剝落（在第二百二十六號窟正壁左上）。

蜀千佛崖尊勝陀羅尼石幢，蜀孟昶明德四年（公元九三七年）丙午九月中旬，三面小楷書，只一面可辨（在第三百六十六號窟）。

此外，〔清〕劉喜海《三巴金石苑》第二本還錄載了廣元千佛崖的一些造像、修妝碑刻題記，茲列舉如下，以供研究參考檢錄。

先天元年（公元七一二年）《大唐利州刺史畢公柏堂寺菩提瑞像頌并序》（第三十六十六號窟）。開元十年（公元七三二年）『弟子彭景宣』造釋迦佛像記（在第一百五十號窟）。開元十八年（公元七三〇年）『朝議大夫守利州刺史屈突季將』造彌勒佛像記。咸通十四年（公元八七三年）『朝議大夫守劍州刺史賜紫金魚袋李諷』『修當陽佛龕』記（在第五百一十三號窟附二十號窟）。中和二年（公元八八二年）『新授朝散大夫巴州化城令王何』建功德記（第二百五十一號窟）。中和三年（公元八八三年）『宣德郎行利州錄事參軍』田某造釋迦佛像記（在第五百三十五號窟附三十五號龕壁上）。乾德六年（公元九二四年）『女弟子越國夫人路氏』重修妝『毗盧大洞』記（在第三百六十六號窟）。同光元年（公元九二四年）『權土客軍都虞侯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劉安文』『造阿彌陀佛』記。

天成二年（公元九二七年）『東川官告使客省副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守衛將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劉處讓』收修功德記（在第二百二十六號窟）。明德四年（公元九三七年）王重叙造陀羅尼經幢記。天聖九年（公元一〇三一年）（姓氏缺）造（缺名稱）『一十八身』記（在第三百六十六號窟）。

千佛崖由於緊靠川陝公路，公路外側即是嘉陵江，搭架編號極為困難。因此，這裡的造像至今尚未編號。我試將千佛崖分為南、北、中三段，分別簡述於下：

北段：最上層有一個大佛洞（第一百三十八號），正壁上雕刻一尊呈善跏趺坐姿的彌勒佛（身軀部份被修補過），其右邊刻阿難（身軀部份也是被修補過），左邊的迦葉已不存。該洞中的像，根據其造型風格，應是北朝時期的作品。在同一層上，大佛洞左邊約二十米處，有兩窟說法圖（分別為第四百二十一號、第四百二十二號），窟呈雙疊室形，外室呈方形，內室的壁面斷面呈弧形。兩窟的構圖都是一佛二僧二菩薩二力士，係初唐的作品。

北段南端下層，靠近路面，有一龕盧舍那佛像（第二百一十二號），構圖為一佛二菩薩二力士。在該龕的上面，有兩個毗鄰的龕，一龕中的主像為彌勒佛（第二百一十一號），另一龕中為釋迦牟尼佛（第二百一十三號）。三龕都是雕刻於盛唐時期。

北段南端中上層，有兩個毗鄰的窟。左邊（南）的一個窟（第三百六十五號），窟中的中心柱與窟底面和窟頂壁相連接；柱上刻有兩株樹，樹的枝干和葉冠呈鏤空狀，其下面雕刻呈善跏趺坐姿的彌勒佛和二弟子二菩薩。這一窟即著名的『樹下彌勒』窟。右邊的一個窟比左邊的要大得多，也是中心柱窟形制，柱上雕刻四株幾乎完全鏤空的七寶樹作為背屏。樹下面的平臺上安置圓雕的造像，係一佛二僧二菩薩二力士。在窟的左壁上雕刻有六個與真人大小相似的樂伎像。因此該窟或名毗盧